

# 1960年代初的台海“反攻”议题

冯琳

**【摘要】**1960年前后,面对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背离,国民党当局在不安与绝望中想要孤注一掷、“自行反攻”大陆。此时,中国大陆面临经济与外交的困难,社会的稳定性出现波动,蒋介石认为时机已至。基于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限制及以往的相关保证和声明,国民党当局并不能真正“自行反攻”,而需要先获得美方首肯。模糊政策之下,为“稳住”蒋介石,信奉“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美国政要曾暗中支持和纵容其“反攻”计划。1962年春夏,中央军委在东南沿海进行战争部署、集结兵力,美国对国民党当局一度放松的缰绳此时才真正收紧,“反攻”议题得到遏止。但是美国担心强行阻止会影响台湾当局的士气,且减弱美国对台湾的控制力,因而仍以拖延战机交付等策略阻止国民党“反攻”,实际上美国对台态度仍然处于“且收且放”的模糊状态。

**【关键词】**反攻;台湾;蒋介石;美国;肯尼迪

**【作者简介】**冯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23.4.91~10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对台政策及蒋美互动的历史考察(1949-1979)”(项目号21AZS011)的阶段性成果。

国民党退台后的“反攻”议题是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sup>①</sup>历来关注者不乏其人。关于1962年“反攻”议题的发酵,以往研究虽然也关注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差异,却往往只将目光投诸于“反攻”本身。在较为单一的叙事语境中,研究者往往看到蒋介石在1962年推动“反攻”是其利用有利的两岸形势而采取的“主动”之举,而多多少少忽略了这个事件中的“被动”之态。片面强调蒋介石对美国的“死缠硬磨”,<sup>②</sup>忽视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背离以及对台湾方面一定限度内的“纵容”,不利于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

## 一、准备“反攻”的“被动性”因素

19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对美国而言是应对失据的不愉快经历。为长期压制蒋介石试图对大陆进行挑衅的心理,不再以“好战的”“内战幸存者”的姿态出现,不再给美国添麻烦,<sup>③</sup>1958年10月国务卿杜

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赴台,压迫蒋介石同其发表联合公报,声明台湾当局认为,恢复大陆人民的“自由”,“基础是中国人民的人心,而胜利地实现这个使命的主要手段是实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非凭藉武力”。<sup>④</sup>

在此之后,负责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报告的运营协调委员会(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sup>⑤</sup>对台湾进行了调查,认为尽管蒋介石政府仍然希望回归大陆,但它正在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在这个报告中,包含了一个综合计划,目的为使台湾当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监护人和领导者”。1957年10月美国在NSC5723中首次出现将台湾当局“视为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监护人”的设想。<sup>⑥</sup>1960年5月,运营协调委员会审查了这个文件,并做出结论。通过塑造传统文化“守护者”的形象从而对海外华侨产生吸引力,这一美国国安政策被传达给台湾

当局。几年后在其它历史因素共同作用下,台湾当局发起了持续数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当然,这种将“反攻”精神化并引至“守护文化”的做法并不能得到美国国安部门所有人的认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George V. Allen)认为,为了获得远东的尊重,台湾不应把自己描绘成“过去的守护者”,而应是“未来的活跃领导者”,特别是“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力领导者”。他认为蒋介石应该像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那样,在奥斯曼帝国崩解后,带领土耳其国民运动在安卡拉组建独立政府,“向前看而不是回头”。<sup>⑦</sup>不管是美国人口中的“守护文化”还是“向前看”,都是希望蒋介石忘掉“该忘的部分”,追求“精神反攻”或“走向独立”。在1960年前后,这是美国国安相关部门对台湾走向的两个期望。

1960年前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势头转弱。1960年11月,主张修正美国对华政策的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当选总统,美国对台政策出现改变迹象。

1950年代,美国凭借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使联合国大会年年通过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缓议案,以“暂不讨论”程序的策略,代替对实质内容的考虑。从1960年起,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浪潮,联合国大会的形势发生变化,绝对主导权不再掌握在美国手上。1962年,联合国大会连续第七年以56比42票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但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主张解决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到1960年代,肯尼迪政府认为在联合国的“缓议”策略已经“用尽”,有意改弦更张。1961年3月14日,美英代表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国务卿指出,用“缓议”即简单多数票的方法已无法继续奏效。如果这个问题在程序性投票中得到解决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保留一个席位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那么责任就在他们。<sup>⑧</sup>

3月10日,美国国务院顾问(George Crews McGhee)在给国务卿腊斯克(David Dean Rusk)的备忘录中称,美国应该寻求在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中建立新

基础,美国应该支持台湾,而不是他们的“大陆野心”,继续追求这些“野心”将危及台湾当局和美国本身的基础。备忘录提出,台湾的最佳政治和军事防御将要求台湾当局继续在联合国派驻代表;在“自由世界”中形成共识,即“台湾人民有权独立于大陆存在”;美国保卫台湾的承诺应在美国的盟友中进行宣传。<sup>⑨</sup>另外有一些顾问则赞成使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大会而将国民党当局保留在安理会。<sup>⑩</sup>

美国打算务实地保留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好了迎接联合国内有关“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讨论的准备,甚至有意在西方世界渗透推广“台湾有权独立”的认识,为将来台湾的“独立”可能奠定思想基础。这引起台湾方面的高度警觉。在腊斯克向“驻美大使”叶公超试探“两个中国”的可能性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对华政策先要求我在联合国演成两个中国,然后再演台湾独立国际化,而其明言我政府只能为台湾地区之政权,放弃大陆之主权为我保存联合国席位之条件。可痛可耻,无以复加,美国外交之愚蠢卑劣一至于此,更令人不能不绝望而定自动反攻大陆之决心”。美国政客关于“中国代表权”和台湾主权地位的妄言令蒋介石感到好笑,他感叹,美国国务卿“不知我反攻大陆,光复中华主权之重要目标甚于其他一切之地位也”,与之相比,“联合国资格”又算得了什么。<sup>⑪</sup>这一天,驻台“大使”庄莱德(Everett F. Drumright)给国务院发去一封电报,指出来到台湾三年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国民党高层认为,美国政府“正在以牺牲他们为代价,寻找摆脱中国僵局的出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国民党当局为此深感不安,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毫无保留地支持自己。由于对“两个中国”意涵的深恶痛绝,国民党最不愿意提出或讨论暗示“两个中国”的替代方案,不管以任何方式。<sup>⑫</sup>

1961年夏,国家安全顾问彭岱(McGeorge Bundy)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指出,国民党对他们与美国的关系“比过去五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安”。他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中,只有美国站

在他们和灾难之间,因此对他们来说,“美国态度变化的最微弱迹象似乎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sup>③</sup>在美国台湾防务司令部司令官斯穆特(Roland N. Smoot)中将看来,蒋介石认为美国政策的改变预示着美国对台湾支持的减少。这时,如果蒋介石的部队处于尽可能高的戒备状态,而大陆处于低谷,蒋介石可能会对大陆采取独立的重大行动。<sup>④</sup>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科默(Robert W. Komer)也意识到,“蒋介石对美国政策的持续担忧在引领他考虑越来越多的赌博”。<sup>⑤</sup>这种不安与担忧在驱使着蒋介石怀着濒于绝望的心情带领台湾当局铤而走险。这是1960年代初蒋介石不断推动“反攻”议题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以往研究经常忽略的蒋介石在1962年准备“反攻”的“被动性”因素。

1960年前后就台湾当局内部而言,也发生了一些导致关系紧张、压力增大的特殊事件,如通过“修宪”的方式使蒋介石连任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如雷震事件的发生等等。有人认为,这些事件在相当程度上似乎也成为蒋介石决心发动军事“反攻”的重要因素。<sup>⑥</sup>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这两个事件所导致的压力高点在1960年,且都在可控之中,并没有看到蒋介石欲借“反攻”释放压力的证据。1960年3月,在被提为“总统候选人”后,蒋介石已有“内心自得”“自信甚坚”之感。<sup>⑦</sup>9月,在逮捕雷震之后,经过大约两周的观察,蒋介石认为,美国舆论不利者只是与自由主义者及美国左派有关的少数报刊而已。这在事前预料之中,两周后“反动之巅峰”已过,不过如此。蒋介石认为自己“顾虑周详,决心坚定,毫不为内外反动之邪恶评论与美国压力所动摇,以理与力皆甚充足耳”。<sup>⑧</sup>到1962年时此二事件的舆论影响已降低很多,更不足为发动“反攻”行动的因素之一。

## 二、“现在就做,否则将永不可能做”

正如多数研究者看到的那样,中国大陆在1960年前后所遭遇到的国内困难和外交挫折,是促使蒋介石将“反攻”口号更多地落到实处的一个外部诱因。1958年大陆全面推开“大跃进”运动,试图利用群众热情,在工农业方面实现不切实际的“跃进”目

标,大放农业“卫星”,钢产量追求“超英赶美”,全民大炼钢铁,建立人民公社等等,加之遭逢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出现“三年困难时期”。同时,中苏关系出现波折,因长波电台等问题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苏联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在中国西部边境也出现紧张局势,从1961年,印军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在中印边界进行武装挑衅和威胁。台湾地区情治机构密切关注着大陆局势,台湾当局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机会。与上层政治人物交往密切的保守共和党专栏作家艾萨浦(Joseph Jr. Alsop)将当时的中国大陆比作装着枯草的谷仓,随时可能因氧化作用而冒出火焰。他的文章称,蒋介石认为“登陆行动将会触发这种自燃”。<sup>⑨</sup>在前节所述因不满、绝望而自我求生的“被动性”之外,趁中国大陆显示出弱态而发动“反攻”的“主动性”通常是海外研究重点关注的方面。

不管是“被动”使然,还是“主动”而为,这些因素推动着蒋介石在“反攻”的路上展开了行动。当然,台湾当局要将“反攻”口号落实还面临很多困难,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没有对大陆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自由。

早在1953年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表示要“解除台湾中立化”之后,美政府担心台湾因此而躁动,不再满足于获得他们的口头保证。美国要求台湾当局“在计划任何将根本改变现在空军行动的模式和节奏的行动时,特别是包括攻击性使用飞机时,必须提前咨询美国”。当时的美国“驻台大使”蓝钦(Karl L. Rankin)解释说,台湾方面对大陆的挑衅性行动将是“损害美国利益”的行动。<sup>⑩</sup>美国以战斗机的交付为筹码施以压力,台湾当局被迫同意此项原则,并以书面材料方式做出保证。<sup>⑪</sup>1954年,在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中,美国以带有明显的片面性质的文字对关键条款进行解释与限制,不但要将台湾方面以往对使用武力的保证法律化,还加上军事部署亦需与美国商议这一无理要求。1958年,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蒋介石迫于美国压力,与杜勒斯发表联合公报,表示“恢复在大

陆人民的自由”的基础在人心，“而非凭藉武力”。<sup>②</sup>因为这些保证、“条约”与声明，台湾当局“无权”自行“反攻”。

对于这些限制，蒋介石始终不能接受。1960年前后，他以实际行动证明着自己对美国的不满。1959年2月，美国方面有报告指出，台北最近的几份报告似乎表明台湾当局“越来越重视军事和准军事活动”。美国国防部认为台湾当局“强调进行反共斗争的和平方法，避免使用武力的挑衅行动是最重要的”，并要求评估台北的报告。<sup>③</sup>蒋介石积极行动着，准备在1960年5月或6月对大陆进行大规模空投，“旨在引发中国西南部的广泛叛乱，并有望成为全国叛乱的前奏”。<sup>④</sup>

1961年，蒋介石继续实施一连串的军事动作，为“反攻”做准备。4月，“国光作业室”在台北县三峡镇（今新北市三峡区）秘密成立，由“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次长”、陆军中将朱元琮兼任主任。国光计划以台澎金马为“反攻”据点，这是第二次国共内战之后国民党当局第一个真正意义上预定假想的大规模“反攻”作战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中国大陆即将拥有核能力的预测也令蒋介石感到不安与急迫。1959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认为，尽管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在过去五年里保持稳定，但由于苏联支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力量预计将增加，“自由世界”安全面临的威胁在增长。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是，中国大陆可能会在1963年前有核武器，尽管几乎可以肯定是在苏联的监管之下。<sup>⑤</sup>美国的预测不完全准确，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比美国预测的时间晚了点，但并没有在苏联的“监管之下”。然而，中国在几年内即将拥有核武器这一预测是重要的，它影响到台湾当局的心理。

1962年，蒋介石认为“（大陆情势的）大规模爆发具有一触即发的可能性”，他不想再等。<sup>⑥</sup>在元旦书告中，蒋介石声称“收复大陆乃是祛除战争的根本之图”，并称“无论在主观与客观的条件上，无论在国内

与国际的环境上，皆不容许我们再有犹豫徘徊的余地，也没有观望等待的时间”。<sup>⑦</sup>因为1954年签订的台美“共同防御条约”换文中规定美国拥有对台湾使用武力与军事部署的“共同协议”权，1958年10月蒋介石在与美方的联合公报中有“非凭藉武力”的说法。<sup>⑧</sup>此时，蒋介石重新审视这些含有对台约束意味的各个文件，认为此时应可与美国共同协议“反攻”之事，而不必修订已有文件。他决定越过美国行政部门和军方，直接与总统肯尼迪试谈，看其态度，再做最后决定。<sup>⑨</sup>1962年春，整个台湾岛的保安措施明显增强。2月下旬，“国防部”成立“战地政务局”，由蒋经国主持，负责筹划“反攻大陆”后的政务与经济重建业务。3月底，“行政院”成立“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兼任主任委员，着手整合台湾的经济与人力资源，囤积物资，为战时做准备。为筹措因“反攻大陆”而增加的国防开支，蒋介石准备于5月1日起开征“国防临时特别捐”，在原有的“防卫捐”基础上另外增加税率和项目，直到翌年6月30日为止。

1962年春，海外媒体聚焦于蒋介石急于发动“反攻”的心态。艾萨浦认为台湾当局现在的心情是“现在就做，否则将永不可能做”，简单地说，就是“反攻或死去”。<sup>⑩</sup>3月24日，英国《经济学人》认为，蒋介石及其当局常常扬言“反攻大陆”，使人听来有厌倦之感，但此次是真的要行动了，不容吾人质疑。<sup>⑪</sup>5月3日，《苏格兰人报》报道，12年来，蒋介石迭次声言反攻大陆，这次似已临“剑拔弩张之地步”。蒋介石已经74岁了，目前这个时机稍纵即逝。如果大陆拥有了核武，而中国共产党内部经济危机得到缓和，蒋介石就失去了一个绝好的“反攻”时机。<sup>⑫</sup>

台湾方面的异动引起美国警觉。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科默给彭岱的备忘录指出，蒋介石的“反攻”会导致在中国爆发一场美苏大战，即使这场战争不扩散，美国也不太可能获胜。一次失败的尝试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并使“我们更难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它作为一个独立政府的地位”。如果苏联介入了，美国就等于“成功地再次推动北平

和莫斯科走到一起”，实际上“推迟了共产主义世界的两个巨人可能相互扼杀”的那一天。“蒋介石可能愿意冒这个险，但我们应该这样做吗？”因此，他建议派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去见蒋介石，转达美国对“反攻大陆”的意见，告诉蒋，即便他发表了呼吁“反攻”的书告，也不会改变美国的政策，并提醒他必须事先与美国进行磋商。<sup>③</sup>

3月14日，哈里曼奉命访台，当晚与蒋介石见面。17日，纽约时报披露，蒋介石透过哈里曼，呼吁肯尼迪总统在大陆发生任何大规模“起义”的情况下，“预先允许”台湾当局攻击大陆。<sup>④</sup>为解除美国的后顾之忧，蒋介石向美国请求的“授权”有个前提，就是在大陆发生“动乱”的时候。当然，即便是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提前授权”，美国也不会给。

### 三、“被拴住的老虎”

1958年杜勒斯曾要求蒋介石“不会试图使用武力重返大陆，除非那里的中国人请他回去，而且这部分中国人有相当数量和可靠的质量”。<sup>⑤</sup>因此，激起大陆人民的“起义”是第二次台海危机后蒋介石试图达成的目标，他认为台湾当局的“反攻”应该以大陆内部的“起义”作为突破口。1960年6月，他曾向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需要设计方法和手段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不是通过外部的军事手段，而是通过激起民众起义”。蒋介石说，“这将是确保共产党垮台并实现稳定的最佳方式”。<sup>⑥</sup>

蒋介石试图说服美国，取得美国对于国民党“挑事”及“借机发挥”的谅解。1959年10月21日，蒋介石向美国提起了中苏的矛盾，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的摩擦或差异始于大约三年前，而在最近，他们之间的摩擦更多地浮出水面，美国对于国民党“反攻”的态度是时候重新考虑了。蒋介石强调自己并没有要求被允许公开地使用军队进攻，但是美国应该同意国民党当局“自由采取必要措施组织和煽动大陆的反共运动”。“是时候让国民党当局使用非军事或准军事措施来挑起事故了”，这是国民党最终取胜的“唯一途径”。<sup>⑦</sup>

大概在1962年冬，台湾方面拟订《对美试探反攻之纲要》，制订就“反攻”问题与美交涉的策略。纲要包括三点：一、取消“协防条约”中对台湾当局军事行动“束缚性之附件”，此点可使美方不受苏联指责。二、供给台湾C-130型运输机三架以上，策动大陆发生“暴动”，避免台湾方面首先登陆“反攻”给美国造成主动挑衅的战争责任。三、美国只要供给台湾武器，可抱以“不干涉内政、不参加内战”之态度，无需参与行动。<sup>⑧</sup>

在美国提出“不凭借武力返回大陆”的要求后，蒋介石认为如果大陆先“乱起来”，国民党趁势“反攻”，美国就不会为此承受国际舆论的指责，因而美国应该不会阻止国民党当局的行动。然而，蒋介石的揣测是否符合美方的心意呢？

1959年夏，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大陆发生“起义”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形成一份非正式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小规模、局部性质的“起义”可能会间歇性地在大陆发生。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全国范围内的“起义”以及大规模的地区“起义”都不太可能出现。报告指出，大陆倘若发生大规模“起义”，国民党当局会对大陆使用武力，从而可能造成符合美国利益的局面，但同样清楚的是，国民党当局对大陆事务的干预“不一定是有利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苏联几乎肯定会对任何大规模“起义”的做出十分强烈的反应，可能会寻求占领东北、内蒙古和新疆，从而导致美苏直接的冲突。不成功的趁乱“反攻”很可能意味着国民党当局的直接倒台，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干预实际上可能会抑制“起义”的发展。这份研究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应该限制国民党当局以支持地方性“起义”为名义对大陆使用武力，事实上，这种干预导致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sup>⑨</sup>可以看出，美国国务院对于国民党在大陆“挑事”并趁乱“反攻”一事态度审慎。他们担心国民党当局“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但未能借机推翻中共政权，反而丢了自己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1962年初当蒋介石的耐心接近极限时，美国国务院决定绕开蒋介石，直接与“外交部长”沈昌焕

交涉,强调在“对大陆采取任何进攻性军事行动时必须获得美国的同意,这一点毫无疑问”。<sup>④</sup>

舆论的声音是混杂不清的,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一同存在,不绝于耳。东方大国的内战状态若要激化成热战,无论如何都是个足以牵动世界的重大问题。正如香港的《中国邮报》所言:“台湾海峡的任何爆炸事件都有世界性的影响”。<sup>⑤</sup>即便在待机“反攻”的紧张态势最为严峻的1962年,也不乏对国民党当局的质疑,甚至嘲笑。1962年5月,香港的观察家对那些认为“反攻”时机已成熟的报导提出怀疑。中共问题的分析家们认为,有一项因素常被忽视,那就是“这是过去一百年以来首次有一个中央政府有效地统治着整个中国”。<sup>⑥</sup>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Adlai E. Stevenson)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指出,蒋介石的“反攻”言论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被嘲笑,代表们询问美方如何控制这些言论,以避免给美国带来的尴尬。<sup>⑦</sup>《芝加哥太阳报》认为,一个人口约一千二百万的省份,自然无法与拥有大约七亿五千万人口的大陆相抗衡,第七舰队也可能阻止驻防金、马的国民党部队运往中国大陆,蒋介石明白此点。<sup>⑧</sup>

于是自1959年到1962年,蒋介石与美国方面实际上处于一种近乎绝望的斗争中。美国的谨慎与迟疑蒋介石不是没有感觉到,而是尽管他知道美国的态度,仍然执拗地认为:自己可以,美国没理由反对。同时,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反攻”并不是一场新的战争,而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这场战争在十几年来并未停止过。国共内战跟美国并没有关系,美国只需根据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协防台澎即可。他向美方代表明确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希望美国参与,只需要美方的“默契”,也许是秘密或间接的后勤支持。<sup>⑨</sup>当然,美国并不相信若此事发生美国可以置身事外。<sup>⑩</sup>

在对台海事务的决断上,美国方面不到特殊紧急时刻通常会采取模糊政策,这也是蒋介石不放弃推动“反攻”计划的原因之一。自1950年代,美国从对台湾的模糊政策中屡屡得到好处。模糊台湾的主权地位,使得美国可以公然干涉台海事务;模糊对

“外岛”的态度,既收震慑之效又维持了美国在远东“自由世界”的威望。1962年,面对台海紧张局势,美国中情局认为还是要继续保持模糊政策。<sup>⑪</sup>在“外岛”的“安全”等台海事务方面,美国对外不明确态度,对内往往也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政策给蒋介石等人造成错觉,认为美国有可能默许甚至暗中支持国民党“打回大陆”。虽然美国国务院在1959年对于国民党“反攻”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但美国并未统一对此事的口径,不断有官员表达对台湾“反攻”的支持之意。

美国中情局克莱恩(Ray Steiner Cline)在1958-1962年期间任台北站长,在“反攻”一事上参与度颇高,他的态度对蒋介石影响较大。1962年1月24日,蒋介石与克莱恩会谈,庆祝台美对大陆高空侦查的成功合作。克莱恩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困难已影响到人心,大陆的反美情绪及仇视肯尼迪总统的情绪也日甚一日。蒋介石询问,是否到了可以讨论“反攻”的适当时机。蒋认为美国国务院向来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为由不支持国民党当局“反攻”,此事希望直接与肯尼迪进行密谈,因为“由双方最高级负责人进行密商,才能获致结论,绝非循一般外交途径所能为功”。蒋介石的说法得到克莱恩的赞同,克莱恩亦认为美国国务院多考虑政治因素而忽略战略因素,军方则反之,与国务院或军方交涉作用都不大。如果台湾方面有对大陆情况的合理研判以及切实可行的对策,相信肯尼迪总统会重视。最后,二人达成不经由其它官方途径,而单独由中情局密达总统的共识。<sup>⑫</sup>

据克莱恩的说法,若断然拒绝台湾方面对于支持大规模空投计划的请求,有可能引起蒋介石强烈反应,导致反美示威或其它干扰美国在台湾工作的情况,并且可以想象,蒋介石可能发动对大陆的“绝望”袭击,并将美国牵进战争。蒋介石本人也有可能辞去领袖职务,使美台关系陷入混乱。因而建议采取拖延政策,通过为空投提供飞机及相应设备和培训为由,可将“反攻”延展6至12个月。在此期间,美国可以决定后续应对措施。<sup>⑬</sup>由此不难推断,美方对

台湾方面某种支持的表态或是允诺有可能也是一种推延的手段。但,不管怎样,克莱恩等与蒋介石有过直接接触的美方官员曾经对其施以“稳住”与“安抚”的策略,这多多少少给蒋介石造成了错觉。

1962年2月下旬,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彭岱赴台。如前所述,在彭岱到台湾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科默曾向其详细分析纵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利害,主张继续严格控制国民党。但是,科默的建议没有对彭岱产生影响。2月23日,在听取了蒋介石关于“反攻大陆”的意见后,彭岱指出,美国不反对国民党当局“反攻”,但美国认为这一问题必须审慎,因为这一行动是“决不可以失败的”。现在已经到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当然,彭岱也不主张蒋介石擅自行动,他告诫蒋:“此事成败关系太大,必须共同继续坦白交换意见”。而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彭岱的鼓励,更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他称:“时机是稍纵即逝、难得而易失的”,表示自己“有绝对获得胜利的把握,不能再等待一年半载”。<sup>⑤</sup>

蒋介石对于“反攻”行动的实施有过周详的考虑,他曾指出“反攻”会遵循几原则:一,不致牵累美国,因为这是中国内政问题,自与美国无关;二,不使美国牵入战争;三,不削弱台湾的防务;四,不给苏联任何攻击美国的借口。<sup>⑥</sup>担心舆论指责、担心被拖入战争、担心台湾自顾不暇、担心美苏直接冲突,这几点正是美国对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着重考虑,确实构成了反对者的理由。蒋介石有意排除美方顾虑,并称不奢望美国公开支持,只是为尽“协商义务”而事先通知美方,表示对盟友的尊重之意。<sup>⑦</sup>即便如此,美国官方始终不能下定决心去支持蒋介石“打回去”。相对于蒋介石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而言,美政府的顾虑显然多了很多。

#### 四、“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4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在提到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时,描述了“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的理论。他认为敲倒一排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个时,可以确定后面的骨牌会很快

地一个接一个倒下。面对东南亚共产主义,需要考虑到“赤化”最深远的影响。<sup>⑧</sup>如果对共产主义做出第一个让步,就会有一连串的反应。假如中南半岛落入共产党的控制,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作用下,会逐渐被“赤化”。多米诺骨牌理论成为日后美国强势介入他国事务的主要依据。1962年在面对蒋介石所力推的“反攻大陆”工作时,这一理论对美国决策层中的一部分人也发挥了作用。

1962年春,在克莱恩允诺向肯尼迪请示支持国民党“反攻”事宜后,经过一系列沟通,一度获得相当积极的回应。3月21日,克莱恩向蒋介石表示,如空投有效,在国民党军登陆时,美可以非正式的后勤及财经援助助之。<sup>⑨</sup>4月5日,克莱恩转达肯尼迪意见,指出美政府对“收复中国大陆”所采取的各种方法和计划皆表赞同。但是根据现在所有情报,尚不能确定此时采取大规模行动能否成功。今后台美双方应密切注意对大陆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加强情报合作,并用空中渗透、海上突击、地面派遣的方法进行侦察与骚扰。此时,国民党当局与美国还秘密协商空投伞兵到大陆的计划,拟在空投成功后采取两栖登陆的军事行动。肯尼迪总统准备两架C-123型飞机装上新式电子设备做空投之用,并拟对其进行至少六个月的训练。美国希望这一类台美合作计划不对外界做任何透露,而空投行动亦必须在极秘密方式下进行。<sup>⑩</sup>虽然克莱恩也明确指出,目前只是着手培养实施行动的能力,并未决定是否将此行动付诸实施,但至少此时透过美国情报部门,蒋介石了解到美国支持台湾方面为“反攻”做准备的意愿。美国方面表示,将立即开始在两架C-123型飞机上装配电子装备,以便支持蒋介石进行较以往规模更大的空投行动,届时一次空降最多可达200人。<sup>⑪</sup>

此时,蒋介石“反攻”的决心颇为坚定,他多次研究台美“共同防御条约”,考虑如何让美国主动修改条约,取消对台湾方面“反攻大陆”的限制,甚至考虑以自己的第四次下野来换取美国对于“反攻”的支持。<sup>⑫</sup>但是,美国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即便有克莱恩等人,甚至是肯尼迪对于蒋介石某些观点的认同,

以及对于提供空投飞机先作训练等方面的积极表态,这是否意味着蒋介石距离自己的“反攻”梦想近在咫尺了呢?

其实不尽然。1961年10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提交的对华政策的文件草案中确立了“门半开”的政策<sup>⑧</sup>,这奠定了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这份文件确定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政策的总方针:“(A)门半开,以便与美国保持更令人满意的关系;(B)平息中美之间的敌意;(C)将责任转移到中共身上;(D)为中苏集团在亚洲的扩张建立更有效的障碍”。为实现这样的方针,美国需表现对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关怀,如着手解除对中共出口粮食和药品的禁运;需消除对中国不必要的挑衅行为,应该审查和停止美国和台湾当局针对大陆的特别行动,试图阻止台湾当局的“反攻”行动;与中国进行谈判与沟通等等。<sup>⑨</sup>基于国际局势发展态势,美国的行政部门制定的政策是缓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敌意,阻止国民党从台湾发起对大陆的“反攻”。

因此,肯尼迪等人只能私下表达对蒋介石“反攻”某种程度的支持或理解,作为政府的意向表达却是谨慎的,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将反对并不愿参与此事。1962年3月29日,当记者问起时,肯尼迪表示,虽然台湾人显然有回到大陆的渴望,但美国需要考虑为此而承担的责任,因此没有必要去探讨潜在的情况。<sup>⑩</sup>《西雅图时报》认为肯尼迪的公开表态实际上“惠及了中共”,很不妥当。虽然大部分美国人不愿意卷入战争,但私下不赞同台湾“反攻”是一回事,公开给予中共安全感是另一回事。<sup>⑪</sup>与此同时,也有美国要人出于朋友情谊向蒋介石等人道出实情。3月30日,当蒋介石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姆尼泽(Lyman Lemnitzer)密告“反攻”战略时,雷姆尼泽以朋友的身份向宋美龄交底,称美国其实并不赞成台湾“反攻”,并嘱咐将此意转告蒋。<sup>⑫</sup>

当月,克莱恩也收到国家安全顾问彭岱关于“反攻”是否在台美“共同防御条约”限制范畴之内的回复。彭岱指出美国继续在1954年12月台美就条约之事的交换意见基础上制定政策,美国仍然完全相

信台湾方面任何使用武力的行动都将是“一个共同协议的问题”。<sup>⑬</sup>彭岱此时的身份是国家安全顾问,也是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他的答复打消了此前蒋介石绕开国务院直接从肯尼迪那里获得特别授权的侥幸心理。

1962年是个不平静的年份。4月,在中央情报局协助下,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在猪湾(吉隆滩)向古巴革命政府发动了一次失败的入侵。这次入侵是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肯尼迪为此颇受指责。古巴担心美国再次进攻,因而接近苏联,导致几个月后的古巴导弹危机。

在东南亚,肯尼迪政府也陷入泥沼。在深陷老挝内战的同时,1961年美军战斗部队首次进入越南<sup>⑭</sup>,开始了漫长的越战。1954年7月,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签署后,法国从老挝撤军,不久美国取而代之,成为干涉越南内政的最重要的外部力量。肯尼迪总统就职后成立专门研究老挝问题的特别工作组(the Laos Task Force, LTF),继续扶植亲美势力,力图控制老挝。美国对老挝事务的介入给美国自身带来许多问题。1962年4月,副国务卿鲍尔斯(Chester B. Bowles)提出备忘录,敦促美国明确定义并公开声明参与东南亚事务的“一个连贯的总体政治目标”。6月13日,他再次向肯尼迪提出,如果不能超越“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原则来解释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目标,美国将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国内外“后果不可预测的事件”。<sup>⑮</sup>

美国在拉丁美洲与东南亚的麻烦并未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国民党“反攻”行动的反应,它们的影响只是间接地作用于美政府承受压力的合力。最直接有效让美国“收紧缰绳”的是中国大陆的军事动作和坚决表态。

## 五、“收紧松了的缰绳”

针对台湾当局的军事冒险企图,中央军委在1962年初就开始了一系列的部署,沿海各军区进行了应急战备训练、调运战备物资、加强战场建设等等。中共中央于春夏之交开始向民众揭露国民党在东南沿海的图谋。4月2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

指出美国要员赴台同蒋介石集团商讨所谓“反攻大陆”问题,美国军舰、飞机对中国广东沿海地区和西沙群岛的侵犯和挑衅,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中国人民不能不以高度的警惕注视着,美帝国主义究竟打算干什么?”<sup>⑥</sup>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要立即动员起来,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各参战部队应当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制定作战方案,加固沿海地区和岛屿的防御工事,抓紧进行战备训练,积极做好后方勤务工作,保证粮弹的运输和供应。要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鼓舞战斗意志,发扬英雄顽强艰苦奋斗的传统战斗作风,紧紧地 and 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保证坚决而迅速地完成歼灭敌人的战斗任务。”<sup>⑦</sup>6月18日,新华社准备好了“正式应战”的新闻稿,为使人民先有心理准备,毛泽东决定先用内部电报形式发给各级党委。指示据此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至于何时公开发表,中央将按照情况需要决定。<sup>⑧</sup>6月24日,《人民日报》将这一新闻稿公开发表。

中央军委决定在军事上做积极准备,6月,作战部队源源不断向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集结。同时,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示着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决心,并提醒着美国时隔不久的中国军队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6月24日的《人民日报》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全国大陆的战争中曾经歼灭过八百万蒋匪军,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曾经把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头破血流。我军是正义之师,士气高昂,有优良的装备和坚固的国防设施,有巩固的后方和全国人民的支援。在这样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面前,蒋匪帮要进犯大陆,那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sup>⑨</sup>6月25日,在朝鲜战争爆发12周年的日子,《人民日报》刊出《美国侵略者的历史教训》的社论,高调纪念朝鲜战争,提醒美国吸取历史的教训。社论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并且时刻准备着迎头痛击美帝国主义支持蒋匪帮对大陆沿海地区的窜犯。”<sup>⑩</sup>

6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感到中国东

南沿海的军队集结动向不同寻常,18日,主管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 Jr.)向国务卿汇报了这一情况。该局分析了几种可能性:一是为了阻止台湾方面可能的攻击,确保中国大陆的应急防御足以应对;二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准备一场新的“外岛”政治军事危机,以检验美国新政府对台湾地区的承诺,提醒苏联注意中国的国家利益,并向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证明,“尽管存在困难,但共产党人的中国仍然强大和充满活力”。还有其它一些现实的可能性,如中国共产党准备使用新武器以突袭方式全力夺取金门和/或马祖等等。但是其它的可能性都不大,最主要的是前两种。<sup>⑪</sup>6月22日,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的研究备忘录指出,如果中国大陆的军队“在福建的集结导致再次轰炸金门或更高级别的攻击,我们相信,北京的目标将既是防御性的,也是进攻性的”。北京已决定“先发制人”,以阻止台湾当局的“反攻”,通过测试美台关系,重新获得在国内外失去的威望。<sup>⑫</sup>

美国认为中国大陆的反应表明,不仅是“外岛”本身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而且大陆对蒋介石的“反攻”意图已做好应对准备,美国和国民党的利益很有可能发生直接冲突。<sup>⑬</sup>6月21日,中情局局长麦科恩(John A. McCone)专为如何应对台海紧张局势的问题咨询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当问到是否支持蒋介石重返大陆时,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的政府会“避免这个问题”,而坚持这样的政策:(1)保护台湾和澎湖的安全;(2)支持蒋介石以维持士气;(3)维持蒋在大陆“开展业务的能力”(情报搜集等),但始终在美国的“完全控制之下”。<sup>⑭</sup>

为应对中国大陆在福建沿海集结兵力的行动,副国务卿鲍尔斯向肯尼迪建议,通过哈里曼非正式向苏联方面打听中国军队在福建调动的信息和动机,并向苏方表示,美国无意在现有情况下支持国民党“反攻”,在未经美国充分协商和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不会采取任何进攻的军事动作。同时,透过英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坦诚交换意见,确保中国共产党不会在误解美国意图的情况下行事。美国准备再次表明:自1955年以来,美国在与中国共产

党人的会晤中,一直敦促双方不要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美国会继续坚持这一立场。<sup>⑤</sup>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通过外交途径向美方施加压力。6月23日,在与美国的会谈中,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提请美方注意台湾地区的局势。他指出,蒋介石集团正准备“反攻大陆”,这一行动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他给出了美国支持国民党当局“反攻”的证据,包括美国对台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增加。他说:“美国在玩火,这种攻击对美国没有好处,美国将为此承担责任”。美国驻波兰大使、中美会谈美方代表卡博特(Cabot, John M.)表示美国无意在现有情况下支持国民党“反攻”。如果国民党当局发动“反攻”,那将违背他们对美国的承诺,卡博特本人不相信他们会这么做。<sup>⑥</sup>

6月26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如果蒋介石一再发表有关返回大陆的挑衅言论,将会给联合国的美国“带来问题和尴尬”。他建议肯尼迪向国民党当局明确表示,美国“无意支持蒋介石在大陆的冒险经历”。<sup>⑦</sup>翌日,肯尼迪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介绍台湾海峡的局势,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向东南沿海集结,动机尚不明了。在这种情况下,阐明美国的立场很有必要。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始终反对在这个地区使用武力”。早些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多次努力使中国共产党同意相互放弃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美国“仍然继续坚持这一政策”。如果那里发生军事行动,美国究竟采取什么行动取决于事态发展,但毫无疑问,1955年美国与台湾当局在“共同防御条约”中明确规定,在我们的共同考虑下,“不得使用武力”。整个条约的性质是“防御性的”。<sup>⑧</sup>

在此之前,美国对于国民党“反攻”的态度是暧昧的,不论是公开还是私下的表态均有反对也有鼓励。直到6月中下旬,美国发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重兵集结,并进行了紧急研究与密集讨论,转用明确的态度去约束国民党当局,并向中国共产党传递“无意挑衅”的善意。另一方面,美国也充分意识到不能过于强硬地去禁止,以免逼急蒋介石。他们意

识到,此时对国民党来说似乎是“绝佳的机会之际”,制止国民党“反攻”、“无限期地冻结现状”,将严重打击台湾当局的士气。“在执政的中国人中间会有一种痛苦和反美的激烈情绪反应,伴随着与美国关系的真正恶化,在政治、军事和情报方面的合作范围将会严重减少”。最糟糕的是,如果蒋介石和他的盟友先前认为美国将以某种形式帮助他们攻击大陆,因“幻想破灭”产生的愤怒会使士气的损害更加严重。<sup>⑨</sup>因此,美国要做的就是,既要明确阻止“挑衅”大陆,又要采取一定策略,避免国民党当局严重的挫败感。

随后,肯尼迪要求国务院向蒋介石传递强烈的观点:美国和台湾当局都要避免在这个时候给人打算对大陆“反攻”的假象,“不能显得咄咄逼人”。在这个时候“反攻”显然是不会成功的,只会使台美看起来像是“军事行动的煽动者”,从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sup>⑩</sup>此后,美国曾承诺提供的C-123型飞机更以种种理由迟迟不予交付,到1962年年底,台湾方面也未收到一架。<sup>⑪</sup>6月底7月初,蒋介石综合研判,认为“良机失却”,“已无缝可乘”,应重新考虑战略与政略。<sup>⑫</sup>

## 六、结论

1957年,美国开始考虑将台湾塑造为“中华文化守护者”。1960年,这一设想经过美方相关部门调查论证,进一步明确、成型。“守护文化”与1958年美国对台湾地区提出的“不凭借武力返回大陆”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效,就是让蒋介石放弃在台海发动热战的念头,维持两岸分离状态。在意识形态问题弱化的1960年前后,美国内部“两个中国”说与“一中一台”说的苗头蠢蠢欲动。甚至有人希望蒋介石“向前看而不是回头”,有人主张在西方世界制造“台湾人民有权独立于大陆存在”的主流认识。蒋介石与台湾当局的不安达到台海危机以来的顶峰。因绝望而决心“自动反攻大陆”,是此时蒋介石的强烈想法。美国打着维持台湾当局联合国席位的招牌大搞“两个中国”,蒋介石要以“反攻”求“中华主权”这一最高目标,以此作绝地反击。这是1962年蒋介石推动“反攻”计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此次国民党掀起

“反攻”高潮的“被动性”因素,是以往相关研究通常忽略的历史背景。

1962年,已是古稀之年的蒋介石认为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虽然迫于形势,蒋介石提出的“反攻”计划曾多次被推迟、搁置,这也是蒋被外界嘲弄的笑点之一。但是,事实上,蒋介石从未彻底放弃自己的“反攻”梦想。“反攻”对他来说,不只是用来提振士气的口号。1960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曲折的时期,经济困难、中苏关系面临考验,蒋介石加紧军事准备,并在1962年将箭搭于弦上。蒋介石认为国共内战并未结束,“反攻”并不是一场新的战争,而是国共之间解决中国内政的战争,因而与美国无关,美国不能参与。这一观点当然不为美国接受。美国认为没有美国的介入,蒋介石的“反攻”是不可能的。但是,蒋介石的看法是基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与不断试探“两个中国”的可能性的美国有着根本的差异。

反观历史,国民党退台以后历次蠢动都与美国惯用的模糊政策有关。美国决策层有观点认为如果“反攻”不成,不但大陆未得,还会失去美国事实上已经掌控的台湾以及金马等“外岛”。但是,模糊政策之下,包括克莱恩、彭岱,甚至是肯尼迪本人都曾向蒋介石传递过有条件地纵容“反攻”的信号。纵容信号的传递与美国历来的模糊政策有关,在克莱恩看来也有“稳住”蒋介石并拖延其“反攻”行动的效果。当然,美国对倘若失败台湾不保的顾虑一直存在,因而在释放积极信号时未曾放开对蒋介石的约束,强调“反攻”属于台美“共同防御条约”所限制的军事行动范围,事先应同美国协商并征得同意。

作为拖延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与台湾方面秘密进行着空投训练,加强情报合作,并承诺提供大规模空投所需的飞机及电子设备。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抱着“走着看”的心理,虽未承诺支持国民党“反攻”,却以实际行动推进着“反攻”的准备工作。1962年,在客观条件展现出“稍纵即逝”的时机时,“反攻大陆”这个在1950年代已经被口号化的沉睡中的词语似乎复活了。蒋介石一度积极行动着,如同“被拴住

但缰绳已被放松的老虎”。

然而,中国共产党并非孱弱的绵羊。大陆虽然遭受到经济与外交上的困难,却仍有顽强的韧性。中央军委注意到台美在海峡对岸的异动,大陆军队在福建的集结是打消美国“走着看”心理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之前,尽管美国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同时陷入麻烦,却没有打算在台海消停。在美国支持国民党当局对大陆的侵扰与侦查的时候,在中情局甚至总统本人对蒋介石的“反攻”行动有所纵容时,他们不提“不以武力改变现状”。但当中国大陆准备回应挑衅时,美国开始强调这一点。多年来,美国打着维持台海和平、反对武力改变现状的幌子介入台海,实际上这只是单方面用于限制中国进行维护自身安全、谋求统一正义行动的工具。“维护和平”的说法是使美国占据“道义”制高点的屡试不爽的法宝,深究之下,却可见其骗局。

1960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所提出的“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深深影响着包括肯尼迪在内的美国政要,对共产主义不能妥协让步成为他们的理念。1962年春中共中央公开表明准备迎战的态度,并在6月前后在东南沿海地区部署大批兵力。此举是最终让美国收敛的关键,其对国民党当局一度放松的缰绳此时才真正收紧,1962年发酵中的“反攻”议题在事实上得到遏制。然而,美国要顾及台湾方面的士气,维持与台湾当局在军事、情报等方面的深度合作,要顾及作为“盟主”的地位和面子,要防止蒋介石“出走”,主要以拖延交付战机等“柔性”手段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反攻”,而不是强行禁止。这也就为后来蒋介石“反攻梦”的伺机复萌埋下了伏笔。

#### 注释:

①大陆及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如:牛大勇:《“栓紧缰绳”与“反攻大陆”: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之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肖如平:《蒋介石“反攻大陆”中的“控苏”与“联苏”——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刘子奎:《肯尼迪政府与蒋介石“反

攻大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张淑雅：《台海危机与美国对“反攻大陆”政策的转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2001年；林正义：《蒋介石、毛泽东、肯尼迪与1962年台海危机》，《远景基金会季刊》第13卷第4期，2012年10月。日本方面的相关研究如：松田康博，《蒋介石と《大陸反攻》：1960年代の對共產黨軍事鬥争の展開と終焉》，山田辰雄·松重充浩編著：《蒋介石研究：政治·戦争·日本》，東京，東方書店，2013年，pp.337-361；石川誠人，《國府の《大陸反攻》とケネディ政權の對應》，《國際政治》148號，2007年3月。英文成果如：Isabelle Cheng. (2018) Saving the Nation by Sacrificing Your Life: Authoritarianism and Chiang Kai-shek's War for the Retaking of China.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7: 2, pp55-86.

②牛大勇：《“栓紧缰绳”与“反攻大陆”：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之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172-183页。

③Talking Paper Prepared by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Taipei, Oct. 21, 195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416.

④Joint Communiqué, Taipei, Oct. 23, 1958, FRU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 442-444.

⑤运营协调委员会是美国于1953年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第10483号行政命令创建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负责整合多个国家安全政策的实施。

⑥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October 4, 1957, FRU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p. 622

⑦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448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une 22, 1960, FRU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 688-689.

⑧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14, 1961,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30.

⑨Draft Memorandum from the Counsel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cGhee)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March 10, 1961,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27.

⑩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Felt)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July 10, 1961,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93.

⑪《蒋介石日记》手稿，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1961年3月20日。

⑫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0, 1961,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37.

⑬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President Kennedy, July 7, 1961,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89.

⑭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Felt)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July 10, 1961,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92.

⑮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January 29,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181.

⑯林孝庭：《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

⑰《蒋介石日记》手稿，1961年3月22日。

⑱《蒋介石日记》手稿，1961年9月17日上星期反省录。

⑲“美专栏作家艾萨浦报导蒋总统透过哈里曼促美赞同反攻”，“美对我反攻大陆计划反应”，“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11-07-02-03-01-067。

⑳“叶公超便条”，1953年4月22日，台“外交部”有关“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后‘反攻大陆’计划案”档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11-07-02-07-01-127。

㉑“美国代办钟华德(英文名不详)与叶公超谈话纪录”(1953年4月30日)，台“外交部”有关“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后‘反攻大陆’计划案”档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11-07-02-07-01-127。

㉒Joint Communiqué, Taipei, Oct. 23, 1958, FRUS, 1958-

1960. China, Volume XIX, pp. 442-444.

㉓ Note of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1, 1959, FRU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523.

㉔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Director for Plan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Bissell) to Colonel Edward G. Lansdale of the Office of Special Operation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18, 1960, FRU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 660-661.

㉕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Parsons)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5, 1959, FRUS, 1958-1960,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Cambodia; Laos, Volume XV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 114.

㉖ Ambassador Drumright discusses mainland recovery issue with Foreign Minister Shen, Feb. 13, 1962, U. 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USDDO), CK2349215925.

㉗《告全国军民同胞书》(1962年1月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3,书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293、298页。

㉘ Joint Communiqué, Taipei, Oct. 23, 1958, FRU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 442-444.

㉙《蒋介石日记》1962年1月8日,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十一册,“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5年,第527-528页。

㉚“美专栏作家艾萨浦报导蒋总统透过哈里曼促美赞同反攻”,“美对我反攻大陆计划反应”,“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11-07-02-03-01-067。

㉛《经济学人》1962年3月4日,“美对我反攻大陆计划反应”,“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11-07-02-03-01-067。

㉜《苏格兰人报》1962年5月3日,“美对我反攻大陆计划反应”,“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11-07-02-03-01-067。

㉝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

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January 29,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 181-184.

㉞“纽约时报驻台记者报导蒋总统曾呼吁美国准我反攻”,“美对我反攻大陆计划反应”,“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11-07-02-03-01-067。

㉟ Talking Paper Prepared by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Taipei, Oct. 21, 1958, FRU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 416.

㊱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18, 1960, FRU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682.

㊲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21, 1959, FRU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 618-619.

㊳《试谈“反攻”案》(无日期,根据内容推测为1961年底),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005-010205-00001-007。

㊴ Letter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Parsons)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Gray), August 19, 1959, FRU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 583-585.

㊵ Chiang's propaganda theme advocating local war as a means of achieving mainland recovery, Jan. 17, 1962, USDDO, CK2349215923.

㊶《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又名《中国邮报》《德臣报》。《港德臣西报评台海局势》,(1962年6月25日),“中央通讯社有关反攻问题参考资料”,“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11-29-99-99-002。

㊷《香港观察家怀疑反攻时机已成熟》(1962年5月1日),“中央通讯社有关反攻问题参考资料”,“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11-29-99-99-002。

㊸ Summary Record of the 500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une 26,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V, Organiza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formation Policy; 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Matter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1, p. 451.

㊹《美记者阿克称第七舰队可能阻我反攻大陆》(1963年1月17日),“中央通讯社有关反攻问题参考资料”,

“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11-29-99-99-002。

④⑤《蒋中正接见彭第谈论有关反攻大陆之谈话要点》(1962年2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馆藏号：005-010206-00071-002。另见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8,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186.

④⑥美方认为不管国民党以何种方式“反攻”，都将需要美国的大量投入，包括空中掩护、空运和海运，以及后勤支持，甚至是地面部队，更不能排除苏联卷入的可能。见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January 29,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182.

④⑦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Hilsman)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June 21,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 260-263.

④⑧《蒋中正与克莱恩谈话记录》(1962年1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馆藏号：005-010206-00071-001。

④⑨ 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ice)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Harriman), March 28,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199.

⑤⑩《蒋中正接见彭第谈论有关反攻大陆之谈话要点》(1962年2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馆藏号：005-010206-00071-002。

⑤⑪《蒋中正接见彭第谈论有关反攻大陆之谈话要点》(1962年2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馆藏号：005-010206-00071-002。

⑤⑫《蒋中正与克莱恩谈话记录》(1962年1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馆藏号：005-010206-

00071-001。

⑤⑬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of April 7, 1954,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2005, p. 383.

⑤⑭《蒋介石日记》手稿，1962年3月22日。

⑤⑮《蒋中正与克莱恩谈话纪要》(1962年4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馆藏号：005-010206-00071-005。

⑤⑯《科尔克等与蒋中正就有关C123型飞机空投暨训练事宜会谈之记录摘要》，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馆藏号：005-010205-00098-003。

⑤⑰《蒋介石日记》手稿，1962年1月16日、3月18日、3月24日。

⑤⑱即“hold ajar the door”，以往研究称之为“微开门”，参见唐小松：《论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对中国的“微开门”政策》，《学术探索》2002年第5期。

⑤⑲ Draft Paper Prepared in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October 26, 1961,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 163-164.

⑤⑳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of March 29, 1962,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2005, pp. 276-277.

⑤㉑《西雅图时报》1962年4月2日，“美对我反攻大陆计划反应”，“外交部档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11-07-02-03-01-067。

⑥①《蒋介石日记》手稿，1962年3月30、31日。

⑥②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 to the Chief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ion in Taipei (Cline), March 6,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191.

⑥③ 1961年5月，为进一步帮助南越政府对付北越及南越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副总统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访问西贡，与吴庭艳签署联合公报。随后派遣美军特种作战部队人员进入南越，美国的越南战争由此开始。作为回应，6月，以范文同总理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中越两国总理也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

报谴责美帝国主义“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继续横蛮地霸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它在越南南方扶植吴庭艳傀儡集团,破坏越南的和平统一”。见《中越人民携手前进,并肩斗争》(《人民日报》1961年6月17日,第2版)。

⑤ Memorandu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Bowles) to President Kennedy, June 13,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I,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4, p. 69.

⑥《严重警告美国侵略者》,《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4月27日,第1版。

⑦《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196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5页。

⑧《对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的修改和批语(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02页。

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匪帮妄图窜犯大陆沿海地区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人民日报》1962年6月18日,第1版。

⑩《美国侵略者的历史教训》,《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6月25日,第1版。

⑪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Positioning, June 18, 1962,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CI01478.

⑫ Chinese communist motivations in a possible offshore islands probe, June 22, 1962, DNSA, CI01485.

⑬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Hilsman)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June 18,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

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248.

⑭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June 21,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257.

⑮ Memorandum From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all to President Kennedy, June 21,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 258-259.

⑯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3,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274.

⑰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June 26,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281.

⑱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of June 27, 1962,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2005, pp. 509-510.

⑲ Effect o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of a U. S. Refusal to Permit an Attack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June 21, 1962, DN-SA, CI01483.

⑳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une 28, 1962,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285

㉑ 见《对美方交涉C-130B与C-123机一案经过》(1963年1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005-010204-00002-011。

㉒《蒋介石日记》手稿,1962年6月30日、7月1日。